

貶謫的意義：劉禹錫傳記比較研究

黃自鴻*

摘要：劉禹錫一直被視為貶謫詩人的代表，他的命運就像許多失意文士的縮影，對後世作家影響深遠。對於他的經歷、性格以至「永貞革新」、王叔文的歷史評價，從兩《唐書》以降，討論一直未有止息。本文嘗試從最貼近我們的現代傳記開始，以「回溯的框架」閱讀正史劉禹錫傳與傳主的自傳作品，探索這些文本的重心。本文以「虛實內外」四個角度，指出上述傳記著重「社會背景」和「傳主事實」的同時，也具有由閱讀角度所構成的「虛構」色彩；在他臨終前的自我辯解中，「永貞革新」並不屬於一次傳主認可的事件。

關鍵詞：傳記 劉禹錫 貶謫 王叔文 「永貞革新」

一. 前言

劉禹錫（772-842）實屬中國歷代文人的一個典型，年僅二十就以進士及第踏上青雲路，開展燦爛的仕途。由於獲得王叔文（753-806）的青眼，三十餘歲已廁身權力核心，輔助順宗（李誦，761-806，805在位）進行改革，史稱「永貞革新」。¹ 未幾，太子李純（唐憲宗，778-820，805-820在位）即位，王叔文旋即外貶，更被賜死異鄉。自此，劉禹錫面對漫長的貶謫生涯，屢遭外放，直到晚年才回到中央。可以說，顛簸坎坷的官運，自是許許多多不甚得意的讀書人之共有投射。

後世注意劉禹錫，既由於「永貞革新」的失敗和他的悲憤人生，也因為他的作品水平極高，歷來作家稱譽有加，其中，最為著名的大約為白居易（772-846）「詩豪」之說。事實上，他的〈金陵五題〉、竹枝詞、「玄都觀」兩首皆受到後世重視和推崇，並產生許多仿作與化用。²

「永貞革新」的失敗和優秀的創作才能，使劉禹錫成為後世的關注焦點。史臣對劉禹錫的評價，將政治事件與人物品格緊扣一起；對於過去以至現代學者而言，要準確了

* 黃自鴻，香港都會大學 人文社會科學院副教授。

1. 有歷史學家認為「永貞革新」並無其事，參黃永年：〈所謂「永貞革新」〉，載《唐代史事考釋》（臺北：聯經出版事業公司，1998年），頁373-400。

2. 採用「劉郎」、「玄都觀」典故和以「金陵懷古」為題的宋詩，以及宋代竹枝詞創作的作品列表，參李亮：《劉禹錫詩歌兩宋接受史研究》（桂林：廣西師範大學碩士論文，2010年），頁87-96。

解詩人的整體，必須全面認識詩人的個性和生平，從而發掘作品的真實所指。自新批評以降，對作家經歷和生平的研究方法受到質疑，認為對探討作品的價值不大，最後只能撰寫出像傳奇小說一般的著述。³ 然而，像杜甫（712-770）遭逢安史之亂、宋（960-1279）明（1368-1644）兩代遺民詩人面對皇朝土崩瓦解一般，劉禹錫曾經歷重大的社會／政治事件，「貶謫詩人」「劉郎」形象深入宋代文人骨髓，⁴ 因此，要探索他的內心世界、作品的思想內容以及後世的接受情形，永貞革新與貶謫生涯自是劉禹錫研究的重心。⁵

與其他文類比較，傳記不但是記載傳主資料敘述其生平的一種文體，更重要的是，對傳主的個性發展作翔實的解說，建立某個傳主形象（例如義士、改革家、猛將等）的同時，特別是對其人生中的關鍵轉折，加以詮釋和論述。⁶ 因此，本文擬以劉禹錫的傳記為討論對象，解讀現代的劉禹錫傳記、正史列傳與劉氏自傳〈子劉子自傳〉，探討這些文本中貶謫的意義，藉以探索傳主／作者的心境，從而與他的文學創作互相映照和比讀。⁷

傳記的解讀策略，除了我們習以為常的「傳主」和「事實」，還可以傳主／社會及虛構／真實兩組觀念說明傳記的文體特點。傳記必然為了經營傳主的形象，在某個時空和社會環境之下的困頓和掙扎，以揭示傳主的個性和人生。由於傳記素被目為歷史（正史）的分支，對社會與環境的描述，有時放在較傳主更為重要的高度。此外，雖然強調事實（真實）是傳記文體的必要特質，但在作者重新編織傳主與事實的同時虛構於焉產生。⁸

-
3. René Wellek and Austin Warren, *Theory of Literature*, 3rd ed. (New York: Harcourt Brace Jovanovich, 1977), pp. 75-80; 中譯參韋勒克、沃倫著，劉象愚等譯：《文學理論》（北京：生活·讀書·新知三聯書店，1984年），頁68-74。
 4. 李亮：《劉禹錫詩歌兩宋接受史研究》，頁59-65。
 5. 有關劉禹錫的研究甚夥，對本文具有啟發意義的著作，包括尚永亮：《貶謫文化與貶謫文學——以中唐元和五大詩人之貶及其創作為中心》（蘭州：蘭州大學出版社，2004年）；洪迎華：《劉柳詩歌明前傳播接受史研究》（武昌：武漢大學博士論文，2005年）；李亮：《劉禹錫詩歌兩宋接受史研究》；余歷雄：〈兩《唐書·劉禹錫傳》同傳人選與載文異同之文史詮釋〉，載中國唐代文學會編：《唐代文學研究》第12輯（桂林：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，2008年），頁703-714；任暉：〈韓愈與劉、柳對永貞革新認識的異同比較略論〉，《周口師專學報》第15卷第4期（1998年），頁11-14；陳琮光：〈「永貞革新」失敗後的劉禹錫與柳宗元〉，《廣西社會科學》第92期（2003年2月），頁127-130。
 6. 傳記的文體特點，詳參趙白生：《傳記文學理論》（北京：北京大學出版社，2003年）；勒熱訥（Philippe Lejeune）著，楊國政譯：《自傳契約》（北京：生活·讀書·新知三聯書店，2001年）；朱文華：《傳記通論》（上海：復旦大學出版社，1993年）；楊正潤：《現代傳記學》（南京：南京大學出版社，2009年）。
 7. 首先以「自傳」命名的作品，有陸羽（733-804）〈陸文學自傳〉及劉禹錫〈子劉子自傳〉。從這個角度看，研究劉禹錫的傳記文本，饒富深意。見川合康三（Kawai Kōzō）著，蔡毅譯：《中國的自傳文學》（北京：中央編譯出版社，1999年），頁172-173；劉喬：《唐代自傳研究》（重慶：重慶師範大學碩士論文，2012年），頁4。
 8. 詳參黃自鴻：〈重組杜甫的面孔：從現代傳記到「心史」的回溯式閱讀〉，《國文學報》第55期（2014年6月），頁67-97。

如果我們相信傳記是探索傳主性格的文體，現代人對作者的描述，經常與作者自我揭露有所抵觸。因此，本文採用「回溯式框架」，由各階段具有代表性的傳記著述，即現代傳記、正史到劉禹錫的自傳，從貼近現代人的外緣資料，逐步回到傳主本人的認知之上，探索貶謫的人生遭遇體現出來的生命意義。⁹

二. 劉禹錫的現代形象：中唐政治與貶謫命運

現代人論述唐代文學，皆視劉禹錫為貶謫詩人的代表，與柳宗元（773-819）命運相似。例如，在袁行霈主編的《中國文學史》中，首先強調兩人「交情甚篤，才華相當，而且『二十年來萬事同』，政治遭遇非常接近，由此奠定了他們的詩歌思想內容的共同基礎」。緊接著，該書談及劉禹錫、柳宗元二人「以極高的政治熱情參加了王叔文為首的革新集團」，在短時間內推行許多政治改革，可是「宦官為首的保守勢力」反對新政，王叔文的改革遭遇滑鐵盧。由於劉柳皆於窮鄉僻壤度過了大半生，在他們的作品中，這種憂傷而又不屈其志的心境，自然成為主要的寫作重心。¹⁰

對於劉禹錫的性格和形象，《中國文學史》的解說非常仔細，謂其「性格剛毅，饒有豪猛之氣，在憂患相仍的謫居年月裏，確實感到了沈重的心理苦悶，吟出了一曲曲孤臣的哀唱。但他始終不曾絕望，始終跳動著一顆鬥士的靈魂」。根據「玄都觀」兩首等的詩作，袁著認為，屢次的打壓，只換來劉禹錫更強大的意志和反抗，更加強了他的詩人氣質。他的作品顯示出面對苦難的氣概、樂觀進取的意識，以及堅忍高尚的人格。¹¹ 如果沒有這個坎坷的經歷，劉禹錫的現代形象及其作品解讀，恐怕將會面目全非。

上溯清(1644-1912)末民初以來的劉禹錫研究，進入二十世紀，上述正義的貶謫詩人塑像，早於三十年代，就由子葵〈劉禹錫〉首先「發現」出來。¹² 這篇研究提綱由劉禹錫小傳、散文與詩歌的成就、政治與人生的思想組成，一開始作者就確立基調，指出中唐相繼發生安史之亂和藩鎮割據，人民流離失所、生活困苦，當時文人的創作，著力表現社會的真實一面，並對朝廷政策作出批評。子葵引用〈答道州薛侍郎論方書書〉，說明劉禹錫自小體弱多病，然後敘述他的為人秉性，「倔強自傲；屢遭貶論，而無後悔之色。少負奇才，兒童時已見器於人」，「偃蹇寡合，乃以文章自適。胸中之氣，伊鬱蜿蜒，泄為章句，以遣愁沮」，甚至以之與屈原（前340？-前270？）相比。¹³

在有關文學成就的章節裏，子葵也以極其正面的態度，評價劉禹錫的文學思想。他特別指出，當時唐代文壇一直受到六朝（220-589）萎靡的文學風氣所影響，劉氏為「革新文學運動」的主將之一，他的散文創作，包括〈華佗論〉、〈因論〉等篇章，能夠說

9. 黃自鴻：〈重組杜甫的面孔〉，頁68-69、91-92。

10. 袁行霈主編：《中國文學史》卷2（北京：高等教育出版社，2003年），頁349-350。

11. 袁行霈主編：《中國文學史》卷2，頁350-351。

12. 進入現代視野，子葵首先對劉禹錫的生平、思想和文學成就加以評述，有開創之功。參杜曉勤：《20世紀中國文學研究·隋唐五代文學研究》（北京：北京出版社，2001年），頁490-499。

13. 子葵：〈劉禹錫〉，《南風》4卷1期（1931年5月），頁1-2。

明他的文風「豪放奔逸」、「縱橫博辯」，作者也引用劉禹錫的文字，強調「其文以達意見志，不為無謂之雕飾」。子葵又舉韓愈（768-824）和柳宗元為例，指出劉禹錫散文自出機杼，而賦文更「豪宕浩博，意味深長」。¹⁴

在研究劉禹錫思想的一節，子葵顯然延續中唐作為黑暗時代的觀點，相信劉禹錫屢次遭遇貶謫的命運，實源於當時政治混濁不堪。因為夢得對於當時政治作出批評，「不遺餘力」，是以多次被貶。作者跟從傳統說法，引用「玄都觀」兩首，謂「語涉譏刺」，「前因看花詩連遭貶黜，今得重來，而新進者隨舊日之執政以俱去因復借此以諷之」。子葵進一步論述劉禹錫的思想，同樣根據遺留下來的文稿，討論他待人接物的倫理觀和振興天下學校的教育觀；此外，從劉禹錫的祭文，子葵也發掘作者悲人自悲的感情因素，因為自傷於懷才不遇，經綸滿腹卻毫無用武之地。雖然如此，評論仍然認為，劉禹錫相信「人生須處逆境，而後有奮鬥精神，否則暖衣飽食，無所用心」。¹⁵ 作者總結道：

括而言之，讀禹錫之作品，可見其長於描寫人生及社會實況，他如譏刺朝政，論辯縱橫，詩詞歌賦，頡頏韓柳，實唐代文人之怪傑者也。¹⁶

子葵的觀點，大致屬於現代國學對劉禹錫的理解，事實上，後來廣獲好評的《劉禹錫評傳》，與前述內容相近，視「永貞革新」為正面的事件。據《劉禹錫評傳》的論述，順宗李誦打算改革，希望改變德宗（李适，742-805，779-805在位）以及宦官積累下來的社會和政治問題，關心「人間疾苦」。在書中，仍然身為太子的李誦、王叔文、八司馬諸人皆屬於忠良的改革集團，至於包括宦官在內的既得利益階層，則為皇帝所寵信的、百姓畏如虎狼的小人。他們等人面對猜忌的唐德宗和激烈的朝廷鬥爭，只能小心翼翼；王叔文目睹陸贄（754-805）的失敗，了解到單靠個人的力量是沒有可能成功的，因此，他積極與各方人才結交，陸續安排左膀右臂出任各個重要職位。¹⁷

按照這個王叔文與「永貞革新」的脈絡，《劉禹錫評傳》指出，在「二王劉柳」的領導下，改革派嘗試糾正德宗年間種種弊政，包括免除人民苛捐雜稅、罷免宮市、嚴懲貪官污吏、減免宮廷人員、對抗地方藩鎮勢力等。即使這些措施獲得百姓支持，「在歷史上具有進步意義」，由於已然觸及宦官階層的利益，各項政策並未全盤落實，就因為「永貞內禪」而奏起挽歌。¹⁸

可以說，在現代傳記的結構中，劉禹錫遭逢貶謫，象徵「永貞革新」與改革集團的挫折，相對的，因為宦官成功奪權，消滅王叔文，過去積弊無法革除，形成唐朝黑暗時代的開端。翻閱後面的章節，更能讓我們進一步認識前述的觀點。劉禹錫一生，曾經長

14. 子葵：〈劉禹錫〉，頁4。

15. 子葵：〈劉禹錫〉，頁8-14。

16. 子葵：〈劉禹錫〉，頁15。

17. 卞孝萱、卞敏：《劉禹錫評傳》（南京：南京大學出版社，1996年），頁41-54。

18. 卞孝萱、卞敏：《劉禹錫評傳》，頁50-54。

期出任朗州司馬和連州刺史，朗州司馬僅屬閒職，夢得只能耐心等待改變的來臨；他本來獲得重召京師的機會，卻由於「玄都觀」一詩引起爭議，成為外放連州刺史的口實。¹⁹

《劉禹錫評傳》敘述，在他出任連州刺史的時候，非常關心當地百姓的生活和民風；他在江南長大，對農民的生活境況十分清楚。在他的〈插田歌〉、〈莫瑤歌〉裏，記載了低下階層的勞動工作，也對不法官員作出抨擊。在傳記中的形象，劉禹錫不但是出色的文人，也是值得後人尊崇的民政家。誠如前述，太子與王叔文集團／宦官階級為黑白二分的善惡勢力，〈插田歌〉中的地方小吏、繼續把持朝政的宦官集團和「昏庸無能，窮奢極侈，不關心朝政」的唐穆宗（李恆，795-824，820-824在位），與關心民生疾苦、「稟性厚道，不以勢利待人，尤其注重朋友之間的情誼」的傳主，屬該部傳記最重要的二元對立，²⁰ 也是構成全書張力的核心所在。如果沒有這個對立結構，文本或有四分五裂的可能。事實上，也有一些劉禹錫的評傳與這個結構相近，視「永貞革新」為反對奸臣的一次正義行動。²¹

立足於後世討論劉禹錫及唐代歷史，我們更容易注視初盛中晚的盛衰交替，並對歷代改革志士致以深切同情。有關王叔文與「永貞革新」的評價，現代學者的觀點，其來有自，清代歷史學家王鳴盛（1722-1797）的觀點，可說是較有代表性的看法。他指出：

《新·叔文傳》云「叔文謀取神策兵，制天下之命」云云，又云「宦人悟奪其權，大怒曰『吾屬必死其手』」云云，語雖小異，意則同。作史者既知此，則叔文之忠於謀國顯然矣，乃論贊又云：「叔文沾沾小人，竊天下柄，與陽虎取大弓，《春秋》書為盜無異。」何宋祁之但以成敗論人乎？叔文所引用者皆賢，無論劉禹錫、柳宗元，才絕等倫，即韓曄亦有俊才，陳諫警敏，一閱簿籍，終身不忘，凌準有史學，韓泰有籌畫，能決大事，程异居鄉稱孝，精吏治，屬己竭節，矯革積弊，沒無留貲，歷歷見〈新傳〉，豈小人乎，何又斥其「傳匪人，規權遂私」乎？至於用范希朝，則《新書》於〈兵志〉已表其欲奪宦者權而不克，於希朝本傳更盛稱其治軍整毅，當世比之趙充國，且歷敘其安民禦虜保塞之功，與《舊·韓遊環傳》所云「大將范希朝善將兵，名聞軍中」者正合，然則叔文之用希朝，舉賢為國，可謂忠矣，斥為小人，直是自相矛盾，何以服叔文於地下。²²

確立王叔文與「永貞革新」的合法性，承認王叔文集團中人的賢良秉性，對解讀劉禹錫的傳主形象，有極為重要的象徵意味。在傳主／社會的傳記軸線上，現代作者為了勾勒劉禹錫的性格和遭遇，必須（竭力）發掘中唐朝廷政治的真相，卻正是由於時間推移而

19. 卞孝萱、卞敏：《劉禹錫評傳》，頁55-75。

20. 卞孝萱、卞敏：《劉禹錫評傳》，頁75-89。

21. 朱炯遠：《劉禹錫傳》（沈陽：遼海出版社，1998年），頁84-106；陳思培：《劉禹錫評傳》（臺北：鴻德文化事業有限公司，2001年），頁73-85。

22. 王鳴盛著，黃曙輝點校：《十七史商榷》（上海：上海書店，2005年），卷89，頁803。

產生的歷史縫隙，對我們這些讀者而言，社會與政治背景，反倒成為無法不置放於傳主之前的主體。貶謫，於現代傳記裏面，重心不限於劉禹錫的心境變化，卻更在於中唐政治的善惡與對錯。

這種閱讀／書寫的策略像有著一種強烈的「政治無意識」。²³ 誠如前述，傳記作家探討古代名人的心理和個性，更多就當時政治氛圍處著手，以圖「知人論世」。劉禹錫屢遭貶謫的命運，傳記作者將之緊扣中唐的政治環境，試圖藉外緣資料，破譯「劉禹錫貶謫←→王叔文人格←→『永貞革新』合理性」的學術線索，並可能擴闊了學術視野和研究價值。新舊《唐書》則不同，視貶謫為足可證明傳主品格的實據。

三. 正史的語境：品格的證據

子葵的論述，說明現代視野下劉禹錫頗為完美的性格和形象；文中涉及夢得個性的文字，如「偃蹇寡合」、「諷託幽遠」等行文，雖然與正史劉禹錫傳的行文相類，卻與這些文獻欲要揭示的傳主形象大異。

回顧新舊《唐書》中劉禹錫的性格和評價，現代讀者可能訝異於具正統地位的歷史著作，對獲得不朽聲名的唐詩名家，有著頗為負面的結論。就兩《唐書》劉禹錫傳的不同，余歷雄已作非常細緻的探討，論點包括：一、從同傳人選的角度，《舊唐書》把劉禹錫置於韓愈、張籍（767?-830?）、柳宗元等「韓門弟子」、「從韓愈遊者」或當時文士之中，既多番讚賞劉禹錫的文學成就，也批評他在政治方面誤墮歧途，以致自毀前程；二、《舊唐書》將劉禹錫、柳宗元與「二王」「六司馬」區分，安排在中唐重要文人傳中，證明史臣認為劉柳與王叔文之流頗有分別；三、《新唐書》則將包括劉禹錫在內的「二王八司馬」於同一傳中，顯然《新唐書》的作者，以政治活動為評價劉禹錫的主要原因；四、新書對劉禹錫的批評較舊書更見嚴厲，較少注意他的文學成就，也認為他無法廁身百官前列是自作自受的結果；五、由於歐陽修（1007-1072）反對王安石（1021-1086）下猛藥式的「熙寧變法」，宋祁（998-1061）則不滿范仲淹（989-1052）「慶曆新政」，因此《新唐書》對「永貞革新」和王叔文等人皆無好感，更刪去舊書〈順宗本紀〉裏的「善政」；六、《舊唐書》在劉禹錫傳中提及白居易（772-846）與傳主唱和，又引用〈劉白唱和集解〉，證明劉禹錫的文學地位；七、《新唐書》對劉白關係的說明較簡單，又引錄劉禹錫〈論教本書〉和〈子劉子自傳〉，表示史臣同意劉禹錫對教育的重視，以及補充了傳主「自為昭雪」的史料。²⁴

延續前人學者的分析，本文嘗試探討兩《唐書》劉禹錫傳欲要表現的「傳主個性」。舊傳依照列傳慣例，首先介紹劉禹錫的家世，特別提到他於貞元九年（793）進士及第，並考獲宏辭科，擅長古文與五言詩，通過杜佑（735-812）而晉身仕途。史臣並

23. 這個用語當然借用自詹明信（Fredric Jameson）的經典著作。參 Fredric Jameson, *The Political Unconscious: Narrative as a Socially Symbolic Act* (Ithaca: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, 1981).

24. 余歷雄：〈兩《唐書·劉禹錫傳》同傳人選與載文異同之文史詮釋〉，頁703-714。

論述傳主與王叔文之間的關係：

貞元末，王叔文於東宮用事，後輩務進，多附麗之，禹錫尤為叔文知獎，以宰相器待之。順宗即位，久疾不任政事，禁中文誥，皆出於叔文，引禹錫及柳宗元入禁中，與之圖議，言無不從。轉屯田員外郎、判度支鹽鐵案，兼崇陵使判官。頗怙威權，中傷端士。宗元素不悅武元衡，時武元衡為御史中丞，乃左授右庶子。侍御史竇羣奏禹錫挾邪亂政，不宜在朝，羣即日罷官。韓阜憑藉貴門，不附叔文黨，出為湖南觀察使。既任喜怒凌人，京師人士不敢指名，道路以目，時號二王、劉、柳。²⁵

這段文字有明確的道德指涉，既說明當時政出叔文，也特別提到劉禹錫、柳宗元受對方禮遇，因而「頗怙威權，中傷端士」、「任喜怒凌人」。我們應該留意，史臣不但認定王叔文緊握政權，武元衡（758-815）、竇羣（763-814）等與他們不睦的官員，事後皆被報復。

按照舊傳，劉禹錫觸犯憲宗等人，本來執政者打算重新起用傳主，卻由於武元衡及諫官反對，不能獲得升遷的機會。元和十年（815），劉禹錫獲召還，宰相打算置於郎署，卻由於「玄都觀」詩「語涉譏刺，執政不悅，復出為播州刺史」。及後，大和二年（828），劉禹錫「前事未已」，再作「玄都觀」其二，終於再惹眾怒；舊傳謂禹錫「終以恃才褊心，不得久處朝列」，俄而「授蘇州刺史，就賜金紫。秩滿入朝，授汝州刺史，遷太子賓客，分司東都」。²⁶

在正史列傳中，與官職、黨爭、性格有關的細節，全都是有機的整體。舊傳交待王叔文打擊敵人的行徑，提到劉禹錫獲得重用之時如何種下日後遭對方報復的禍根，更進一步對他的品行表示否定，即使他面對多次貶謫，也（幾乎）獲得多次赦免的許可。按舊傳的觀點，劉禹錫一再浪費重生的機會，足證此人有才無德，「人嘉其才而薄其行」。²⁷ 文中多番提及劉禹錫的官職遷移，皆屬於晉升或較有前景、權力的職位，例如郎署、²⁸ 知制誥，以至於晚年獲賜紫衣、金魚袋，²⁹ 凡此皆可看出史臣的用心。

相對而言，舊傳討論劉禹錫的文學造詣，並無吝嗇之態，極力讚賞他在朗州時期的作品，謂傳主因謫居蠻荒，心情鬱悶，「唯以文章吟詠，陶冶情性」，當地人民每多歌

25. 劉昫（887-946）等：《舊唐書》（北京：中華書局，1975年），卷160，頁4210。

26. 劉昫等：《舊唐書》，卷160，頁4210-4212。「玄都觀」詩事見孟榮（生卒不詳，875年進士）：《本事詩》，孟榮等撰，李學穎標點：《本事詩·續本事詩·本事詞》（上海：上海古籍出版社，1991年），頁15。學者認為，《本事詩》明言劉禹錫受嫉妒和誹謗，兩《唐書》卻改寫為傳主本人的品格問題。見李亮：《劉禹錫詩歌兩宋接受史研究》，頁22。

27. 劉昫等：《舊唐書》，卷160，頁4212。

28. 舊傳說明稍嫌簡略，然而「郎署」一語，說明劉禹錫本獲由刺史改任郎官的機會，在唐代官制而言，卻屬於升遷的徵兆。有關郎官與刺史的轉職問題，參賴瑞和：《唐代中層文官》（臺北：聯經出版事業公司，2008年），頁183。

29. 賴瑞和：《唐代中層文官》，頁188。

詠禹錫之作；傳末，談及劉禹錫與白居易相善，每和唱之，「時無在其右者」，「雖名位不達，公卿大僚多與之交」。³⁰

就如學者所說，新傳對劉禹錫的抨擊，較舊傳更尖銳。例如，一開頭談及劉禹錫、王叔文與「永貞革新」的敘述，由「頗怙威權，中傷端士」改寫為「頗馮藉其勢，多中傷士」，更突顯傳主以至改革派恃勢而驕的負面形象。此外，對於「玄都觀」兩首涉嫌譏刺一事，新傳同樣選用更強烈或更具體的表達用字，包括「以詆權近，聞者益薄其行」、「恃才而廢，褊心不能無怨望，年益晏，偃蹇寡所合，乃以文章自適」。雖然最後傳主獲得「素善詩，晚節尤精，與白居易酬復頗多。居易以詩自名者，嘗推為『詩豪』」的讚賞，³¹ 卻顯然不屬於新傳關心的話題。

承上所述，文學成就並非新傳的重心，與舊傳相似的段落，史臣將舊傳稱讚劉禹錫朗州司馬時期作品的文字改寫，相比起來，新傳更多交代傳主的人生歷程，而較欠缺事實與傳主個性的呼應：

憲宗立，叔文等敗，禹錫貶連州刺史，未至，斥朗州司馬。州接夜郎諸夷，風俗陋甚，家喜巫鬼，每祠，歌〈竹枝〉，鼓吹裴回，其聲傴僂。禹錫謂屈原居沅、湘間作九歌，使楚人以迎送神，乃倚其聲，作〈竹枝辭〉十餘篇。於是武陵夷俚悉歌之。³²

此外，身處窮鄉僻壤的傳主，依照新傳的敘述語境，由於內心鬱結而寫下賦作多篇。與他在「永貞革新」和貶官中所表現的品格相約，無法升遷自是史臣所認為的傳主本質：「禹錫久落魄，鬱鬱不自聊，其吐辭多諷託幽遠，作〈問大鈞〉、〈謫九年〉等賦數篇。〔……〕欲感諷權近，而憾不釋。」³³

總結兩《唐書》的劉禹錫傳，上面的討論，清楚說明貶謫與品格之間密不可分的關係。於現代傳記的角度，「永貞革新」屬進步的政治改革，劉禹錫參與其中，期望改善唐代政治環境與人民生活，可是最後因為昏庸之主和卑鄙小人，致使運動流產；在正史裏面，劉禹錫的人品卻教史臣不敢恭維，每次貶官和復官，都證明劉禹錫品格不端。因此，兩《唐書》的論贊部分，對「永貞革新」與王叔文一眾表示強烈否定：

貞元、太和之間，以文學鞏動搢紳之伍者，宗元、禹錫而已。其巧麗淵博，屬辭比事，誠一代之宏才。如俾之詠歌帝載，黼藻王言，足以平揖古賢，氣吞時輩。而蹈道不謹，昵比小人，自致流離，遂隳素業。故君子羣而不黨，戒懼慎獨，正為此也。³⁴

叔文沾沾小人，竊天下柄，與陽虎取大弓，《春秋》書為盜無以異。宗元等撓節

30. 劉昫等：《舊唐書》，卷160，頁4210-4213。

31. 歐陽修、宋祁：《新唐書》（北京：中華書局，1975年），卷168，頁5128-5131。

32. 歐陽修、宋祁：《新唐書》，卷168，頁5129。

33. 歐陽修、宋祁：《新唐書》，卷168，頁5129。

34. 劉昫等：《舊唐書》，卷160，頁4215。

從之，微幸一時，貪帝病昏，抑太子之明，規權遂私。故賢者疾，不肖者媚，一債而不復，宜哉！彼若不傳匪人，自勵材猷，不失為名卿才大夫，惜哉！³⁵

劉禹錫的才能獲兩《唐書》史臣肯定，就如《新唐書》文藝傳謂「文學為下科」，³⁶ 品格和文學能力其實屬於兩種不同範疇，從史臣的角度看，對他人品的否定，並不妨礙我們欣賞傳主的作品。

有關劉禹錫的評價，學者指出，自北宋（960-1127）以降，文人學者不斷反思「永貞革新」的相關歷史問題，其中，范仲淹和王安石的觀點最有代表性，可說是能夠確立劉禹錫正面形象的理論根據。范仲淹〈述夢詩序〉不同意《舊唐書》以成敗論英雄的準則，正是王鳴盛等翻案者的知音：

劉與柳宗元、呂溫數人坐王叔文黨，貶廢不用。覽數君子之述，而禮意精密，涉道非淺，如叔文狂甚，義必不交。叔文以藝進東宮，人望素輕，然傳稱知書，好論理道，為太子所信。順宗即位，遂見用，引禹錫等決事禁中。及議罷中人兵權，梧俱文珍輩，又絕韋臯私請，欲斬劉關，其意非忠乎？臯銜之，會順宗病篤，臯揣太子意，請監國而誅叔文。憲宗納臯之謀，而行內禪，故當朝左右謂之黨人者，豈復見雪。《唐書》蕪駁，因其成敗而書之，無所裁正。孟子曰：「盡信書不如無書。」吾聞夫子褒貶，不以一疵而廢人之業也，因刻三君子之詩而傷焉。至於柳、呂文章，皆非常之士，亦不幸之甚也。³⁷

讀者應該注意這篇文字本屬「引言」，讀過李德裕（787-850）〈述夢詩四十韻〉後有所感慨，對幾位中唐詩人作出評論；如前所述，正史並不以品格與文學為相應的人才素質，范仲淹對「永貞革新」的翻案，卻正是出於「覽數君子之述，而禮意精密，涉道非淺」的心理狀態，對李德裕、劉禹錫等幾位中唐詩人表示深切同情。范仲淹的文字著重劉禹錫（優秀）文人的背景，王安石的〈讀柳宗元傳〉也與范文相似，視八司馬為「天下之奇材」，能夠自強不息，於是獲得不朽名聲。他的觀點，顯然建基於劉柳的創作水平：

余觀八司馬皆天下之奇材也，一為叔文所誘，遂陷於不義，至今士大夫欲為君子者，皆羞道而喜攻之。然此八人者既困矣，無所用於世，往往能自強以求列於後世，而其名卒不廢焉。而所謂欲為君子者，吾多見其初而已，要其終能毋與世俯仰以自別於小人者少耳，復何議彼哉？³⁸

雖然如此，正史新傳確實有廣泛影響，例如元代（1271-1368）辛文房（生卒不詳，

35. 歐陽修、宋祁：《新唐書》，卷168，頁5143。

36. 歐陽修、宋祁：《新唐書》，卷201，頁5726。

37. 范仲淹：〈述夢詩序〉，載《范文正公文集》（《續修四庫全書》第1313冊，上海：上海古籍出版社，1995年），卷8，頁297。

38. 王安石：〈讀柳宗元傳〉，載《臨川文集》（《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》第1105冊，臺北：臺灣商務印書館，1985年），卷71，頁592。

約1304-1324年在世)的《唐才子傳》，基本依照新傳為底本。³⁹我們也不應忽略，在正史強調是非功過的同時，後世的方志著述，將批評劉禹錫的文字省去。例如，《定縣志》僅言傳主與王叔文交往，獲得對方信任並馬上得到擢升，憲宗登位後因叔文之故，屢遭貶斥，也有提及「玄都觀」詩事，被再次外放。在書中，作者特別保留劉禹錫獲裴度(765-839)賞識，可當裴度罷相以後出為蘇州刺史，並謂「以政最，賜金紫」、「晚年以文章自適，白居易推為『詩豪』，會昌時加檢校禮部尚書卒」，⁴⁰另一部《汝州志》，則將重心放在柳宗元和裴度為劉禹錫求情的故事。⁴¹如果後世的地方史家不同意正史批評，我們是否可以在劉禹錫的自傳中，發掘有用的信息，與正史內容互相呼應？

四. 〈子劉子自傳〉：臨終的剖白

《新唐書》引用〈子劉子自傳〉，看作是劉禹錫的自辯。傳記是傳主心靈的記錄，⁴²那麼，〈子劉子自傳〉確實屬於劉禹錫這位少年早發的傳奇詩人，臨終之時不得不說的自我剖白。因此，要了解貶謫一事對劉禹錫造成的心理影響，甚至可以說，若要撰寫劉禹錫的傳記，將事實、傳主心理和社會境況交織起來，〈子劉子自傳〉必然是較其詩文處於首要地位的重要文本。

按新傳的記載，劉禹錫「始疾病，自為〈子劉子傳〉」，⁴³這篇文章屬作者病中回首一生的肺腑之言，所記錄的內容，自是傳主臨終前刻骨銘心的真實寫照。在第一段中，他不但清楚說明這是一篇自傳，更詳述家世，自稱血緣可以上溯中山靖王劉勝（?-前113）：

子劉子，名禹錫，字夢得。其先漢景帝賈夫人子勝，封中山王，諡曰靖，子孫因封為中山人也。七代祖亮，事北朝為冀州刺史、散騎常侍，遇遷都洛陽，為北部都昌里人。世為儒而仕。墳墓在洛陽北山，其後地狹不可依，乃葬滎陽之檀山原。由大王父已還，一昭一穆如平生。曾祖凱，官至博州刺史。祖鎰，由洛陽主簿察視行馬外事，歲滿，轉殿中丞、侍御史，贈尚書祠部郎中。父諱緒，亦以儒學。天寶末應進士。遂及大亂，舉族東遷，以違患難，因為東諸侯所用。後為浙西從事，本府就加鹽鐵副使，遂轉殿中，主務於埇橋。其後罷歸浙右，至揚州，遇疾不諱。小子承夙訓，稟遺教，眇然一身，奉尊夫人不敢殞滅。後忝登朝，或領郡，蒙恩澤，先府君累贈至吏部尚書，先太君盧氏由彭城縣太君贈至范陽郡太夫人。⁴⁴

39. 孫映達校注：《唐才子傳校注》（北京：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，1991年），卷5，頁498-499。

40. 賈恩絨（1865-1948）纂修：《定縣志》（臺北：成文出版社，1969年），卷14，頁777-778。

41. 王雄（生卒不詳，1493年進士）纂，承天貴（生卒不詳，15-16世紀在世）修：《汝州志》（《天一閣藏明代方志選刊》，上海：上海古籍出版社，1963年），卷5，頁1下-2上。

42. 趙白生：《傳記文學理論》，頁5-14。

43. 歐陽修、宋祁：《新唐書》，卷168，頁5131。

44. 劉禹錫：〈子劉子自傳〉，載劉禹錫著，《劉禹錫集》整理組點校，卞孝萱校訂：《劉禹錫集》（北京：中

由七代祖開始，劉氏就「世為儒而仕」，可見他的家學淵源，其來有自；同時，自報名號、家世、歷任官職、人生重要細節和四言韻文，看起來就像是一篇自撰墓誌銘，而與一般傳記，或稍早之前的陸羽（733-804）〈陸文學自傳〉——第一篇正式以「自傳」命名的作品——並不相同。從這個方面看來，〈子劉子自傳〉的確屬於劉禹錫人生最後階段的創作。

第二段，夢得從自己行冠禮開始敘述。年僅二十，他就成功進士及第，「一幸而中試」。不但如此，未幾又再通過吏部取士科，很快就取得釋褐的機會，自言「名浮於實，士林榮之」：

初，禹錫既冠，舉進士，一幸而中試。間歲，又以文登吏部取士科，授太子校書。官司閑曠，得以請告奉溫清。是時年少，名浮於實，士林榮之。及丁先尚書憂，迫禮不死，因成痼疾。既免喪，相國揚州節度使杜公領徐、泗，素相知，遂請為掌書記。捧檄入告，太夫人曰：「吾不樂江、淮間，汝宜謀之於始。」因白丞相以請，曰：「諾。」居數月而罷徐、泗，而河路猶艱，遂改為揚州掌書記。涉二年，而道無虞，前約乃行，調補京兆渭南主簿。明年冬，擢為監察御史。⁴⁵

賴瑞和指出，唐代校書郎只秩九品，毫無疑問是一個小官，不過這種官職清貴，工作優閒，常常與重要的權貴接觸，日後成為宰相的校書郎大有人在。⁴⁶ 因此，劉禹錫在授官之始就擁有良好出身，準備迎接金光燦爛的人生。相似的記載可見約成於833年前後的〈劉氏集略說〉：「始余為童兒，居江湖間，喜與屬詞者游，謬以為可教。視長者所行止，必操觚從之。及冠，舉秀才，一幸而中說〔試〕。有司懼不厭於眾，亟以口譽之。〔……〕」⁴⁷ 貫穿整個文本的是傳主的仕途，也是他最希望讀者留意的中心。

第三段當然是全文主體。劉禹錫認同，「永貞革新」與王叔文確定了他一生的主旋律，王叔文因奕棋博得太子好感，被破格提拔。對於王叔文的功過優劣，劉禹錫雖然沒有明白說出自己觀點，〈子劉子自傳〉流露出他與王叔文分道揚鑣：

貞元二十一年春，德宗新棄天下，東宮即位。時有寒儒王叔文，以善弈棋得通籍博望。因間隙得言及時事，上大奇之。如是者積久，眾未之知。至是起蘇州掾，超拜起居舍人，充翰林學士，遂陰薦丞相杜公為度支鹽鐵等使。翌日，叔文以本官及內職兼充副使。未幾，特遷戶部侍郎，賜紫，貴振一時。愚前已為杜丞相奏署崇陵使判官，居月餘日，至是改屯田員外郎，判度支鹽鐵等案。初，叔文北海人，自言猛之後，有遠祖風，惟東平呂溫、隴西李景儉、河東柳宗元以為信然。

華書局，1990年），卷39，頁590。

45. 劉禹錫：〈子劉子自傳〉，載劉禹錫著，《劉禹錫集》整理組點校，卞孝萱校訂：《劉禹錫集》，卷39，頁590-591。

46. 賴瑞和：《唐代基層文官》（臺北：聯經出版事業公司，2005年），頁88-90。

47. 劉禹錫：〈劉氏集略說〉，載劉禹錫著，《劉禹錫集》整理組點校，卞孝萱校訂：《劉禹錫集》，卷20，頁250-251。

三子者皆與予厚善，日夕過，言其能。叔文實工言治道，能以口辯移人。既得用，自春至秋，其所施為，人不以為當非。⁴⁸

王叔文「北海人，自言猛之後，有遠祖風」，也獲得柳宗元在內的人才肯定，似乎作者認可他的家世和人格。可是緊接而來的文字，實在表現出劉禹錫的心聲，王叔文為一介小人，只是事後孔明之見而已：「實工言治道，能以口辯移人。既得用，自春至秋，其所施為，人不以為當非。」⁴⁹

第三段承前，傳主解釋王叔文以及自己的下場：

時上素被疾，至是尤劇。詔下內禪，自稱太上皇，後諡曰順宗。東宮即皇帝位。是時，太上久寢疾，宰臣及用事者都不得召對。宮掖事秘，而建桓立順，功歸貴臣。於是，叔文首貶渝州，後命終死。宰相貶崖州。予出為連州。途至荊南，又貶朗州司馬。居九年，詔徵，復授連州。自連歷夔、和二郡，又除主客郎中，分司東都。明年追入，充集賢殿學士。轉蘇州刺史，賜金紫。移汝州，兼御史中丞。又遷同州，充本州防禦、長春宮使。後被足疾，改太子賓客，分司東都。又改秘書監分司。一年，加檢校禮部尚書兼太子賓客。行年七十有一，身病之日，自為銘曰：⁵⁰

對於後來的永貞內禪，劉禹錫似乎也如前一樣採取含混的寫作策略，以「宮掖事秘」一語帶過；除「身病之日，自為銘曰」之外，整整百多字都是他的官場履歷，接近（自撰）墓誌銘的傳統寫法。後半開頭，他提到王叔文和韋執誼（生卒不詳，803-805年在世）的末路，前者賜死，後者被貶崖州後病死，傳主則死裏逃生，得以善終。從劉禹錫的文字看來，除了朗州司馬和部分地方職務，他似乎沒有抱怨自己仕途不順，晚年因為足疾，改任太子賓客等一系列閒職，雖然終其一生，未能回到朝廷的權力重心。直到文末的四言韻語，傳主才道出他深藏心處的說話：

不夭不賤，天之祺兮；重屯累厄，數之奇兮。天與所長，不使施兮；人或加誅，心無疵兮。寢於北牖，盡所期兮；葬近大墓，如生時兮。魂無不之，庸詎知兮！⁵¹

縱使他有感自己不夭不賤，也算是得到上天的眷顧，可是他檢視自己一生，的確遭遇了太多不測。上天施予他特長，卻沒給他發揮所長的機會，甚至面對種種毀謗，他都認為已經心無罣礙。

48. 劉禹錫：〈子劉子自傳〉，載劉禹錫著，《劉禹錫集》整理組點校，卞孝萱校訂：《劉禹錫集》，卷39，頁591。

49. 川合康三認為該文對王叔文盡是負面描述，劉禹錫欲證明當日跟隨他是大勢所趨。見川合康三著，蔡毅譯：《中國的自傳文學》，頁200-201。

50. 劉禹錫：〈子劉子自傳〉，載劉禹錫著，《劉禹錫集》整理組點校，卞孝萱校訂：《劉禹錫集》，卷39，頁591-592。

51. 劉禹錫：〈子劉子自傳〉，載劉禹錫著，《劉禹錫集》整理組點校，卞孝萱校訂：《劉禹錫集》，卷39，頁592。

可以說，這段文字應該是最能揭示他內心風景的敘述。川合康三根據上文，認為作者心情是複雜的，他既不能支持也不能無所顧忌地否定王叔文，不能作出自我否定；「面無愧色地對自己做了堂而皇之的肯定」，是為了強調在「永貞革新」的處境，自己只是秉公辦事而已。⁵² 歷代許多評論家，包括歐陽修、宋祁、蘇軾（1037-1101）、晁補之（1053-1110）等，一致認為劉禹錫品行不端，依附小人，「雖已敗猶不悛」，〈子劉子自傳〉只是強以自辯而已。⁵³

川合康三的見解，解決了〈子劉子自傳〉的細讀問題，指出蘊含在內的矛盾情緒，某程度上同意「自辯」一說。延申川合觀點，進一步分析這個重要文本，我們應該注意「一幸而中試」、「是時年少，名浮於實，士林榮之」，傳主必然曾經有過年少氣盛的日子，不但與正史相近，也更表現出他不堪回首、趾高氣揚的過去。新舊兩傳對劉的評價，認為他跟隨王叔文時氣傲囂張，應該屬實。他說王叔文「能以口辯移人」，又云「宰臣及用事者都不得召對。宮掖事秘，而建桓立順，功歸貴臣」，將「永貞革新」看作為王叔文與宦官的一次政治鬥爭。傳主既謂「人或加訕，心無疵兮」，顯見他的確受到外間的種種批評；參考臨終者心理的著作，當人準備到達生命的終點，為了支撐精神的需要，心靈風景是力量的來源。臨終者回憶人生大事，其中既有值得欣喜的過去，也有種種失敗的經歷。心理輔導師建議親人與臨終者早日面對不成功的人際關係，嘗試尋求寬恕與和解。⁵⁴ 循此，「心無疵兮」當然是他自我寬恕與辯解的告白，從而踽踽獨行最後的人生路。

五. 結語

總結全文，現代學者由於身處時空的需要，當他們試圖探討劉禹錫的人生，社會背景和「永貞革新」成為他們最主要的參考素材，夢得多次貶謫，恰正能夠放進「永貞革新」的學術框架之中。從傳記文體的解讀角度看，傳主的內心和個性，被「事實」和「背景」兩種元素所凌駕；若太強調傳記的背景與事實，對被塑造的傳主而言，更形成另一種「虛構」的可能。同樣是貶官的細節，配合「永貞革新」於宋代的污名、傳主的官運和其他著作的渲染，正史在承認劉禹錫文才出眾的同時從貶謫一事發掘傳主的品格，「個性」較鮮明地呈現在讀者眼前。劉禹錫臨終撰述的〈子劉子自傳〉，一方面對於「事實」的（再）詮釋有強烈的個人因素，發掘正直無瑕的自我，看起來不甚符合「真實」的要求；另一方面作者內心的夫子自道，卻能夠容許我們探索傳主的「個性」。貶謫為劉禹錫改變人生格局的樞紐，在人生最後的關頭，認為在年輕時受到王叔

52. 川合康三著，蔡毅譯：《中國的自傳文學》，頁200-201。

53. 蘇軾：〈劉禹錫文過不悛〉，載蘇軾著，孔凡禮點校：《蘇軾文集》（北京：中華書局，1986年），卷65，頁2038；晁補之：〈唐書雜論〉，載《雞肋集》（《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》第1118冊，臺北：臺灣商務印書館，1985年），卷48，頁801；李亮：《劉禹錫詩歌兩宋接受史研究》，頁23-24。

54. 霍爾德（Jennifer Sutton Holder）、克蘭頓（Jann Aldredge-Clanton）著，吳宇琦、方志燕譯：《臨終：精神關懷手冊》（上海：上海譯文出版社，2006年），頁27-29。

文蠱惑而走了歧路，貶謫不是自己的缺失而是天命。我們通過以上的三重閱讀，在「局部的真理」中探索有關劉禹錫的種種，⁵⁵「永貞革新」並非一次他認為應該正面對待的事件，它更屬於王叔文與宦官之間的鬥爭；若要勾勒劉禹錫的主要個性和生平細節，他依附威權、自視極高、對仕途充滿渴望和滿含失敗的苦悶，皆屬於值得重視的關鍵部分。⁵⁶ □

55. 黃自鴻：〈重組杜甫的面孔〉，頁71。

56. 陳思培認為，劉禹錫一生仕途失意皆源於一個「傲」字。在這基礎上，我們還應考慮劉禹錫對政權的欲望和因失敗而造成的壓抑等個性。見陳思培：《劉禹錫評傳》，頁141。